



應用倫理學 的新面向

劉阿榮◎主編

B82
200924

應用倫理學的新面向

劉阿榮◎等著



應用倫理學的新面向 / 劉阿榮等著. — 初版.

-- 臺北縣深坑鄉：揚智文化, 2007. 11

面； 公分

ISBN 978-957-818-854-9 (平裝)

1. 應用倫理學 2. 文集

190.7

96022664

圖書編號：A9050

應用倫理學的新面向

著 者／劉阿榮等

出版者／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葉忠賢

總編輯／閻富萍

登記證／局版北市業字第 1117 號

地 址／台北縣深坑鄉北深路三段 260 號 8 樓

電 話／(02)8662-6826

傳 真／(02)2664-7633

E-mail / service@ycrc.com.tw

印 刷／鼎易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ISBN / 978-957-818-854-9

初版一刷／2007 年 11 月

定 價／新台幣 400 元

序

從學術研究與社會關注的焦點來看，很少有如「倫理學」議題的起伏變化：傳統社會中，把倫理道德視為社會安定的基石；新文化運動以來，又把它看做「吃人的禮教」，必欲去之而後快。曾幾何時，社會脫序、人欲橫流，學術界、社會上、政府與媒體……均強烈呼籲：要重視倫理道德、要加強倫理教育，使得「倫理學」又成為晚近的「顯學」，紛紛在大學中開設。

倫理學研究的核心在於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相互關係。自古以來，東、西方思想家、政治家已有各種不同的言說論述。但近代倫理學的許多理論概念、研究路徑，大抵深受西方學術影響，並將「倫理學」置於「知識系統」作分析思辨，而不同於傳統文化中，將倫理道德納入「德行系統」去反省實踐。當然，若能使知識系統與德行系統結合：「知行合一」、「智德兼備」是一種理想的目標；然而實際上在學術關懷與研究旨趣上，知識與實踐還是各有偏重的。

一般說來，近代倫理學依研究取向與學術路徑，大致可以分為三種：規範倫理學、描述倫理學與後設倫理學。規範倫理學著重「應然」的規範，考究是否符合倫理原則，一般傳統倫理學、哲學家致力於此；描述倫理學探究「實然」的現象，並以是否符合社會公平正義為依歸，許多政治、經濟、法律……等社會科學的哲學思辨，常推展到此一層界；至於後設倫理學，則以分析倫理道德的後設意義，是否符合邏輯意含、語詞意義、經驗檢證等，通常為語言學、分析哲學家所關注的焦點。

事實上，倫理學的研究，如果僅止於理論探討、語詞分析、抽象思維，終究與現實生活有所隔閡。因此，晚近「應用倫理學」的發展，正符合社會需求和理論知識的實踐性，亦即將倫理學應用在現代生活的各個面向，以處理不同議題；或在不同專業中，樹立起倫理道德的規範。所謂生命倫理、企業倫理、社會倫理、政治倫理、行政倫理、新聞倫理、網路倫理、醫學倫理、法律倫理、環境倫理……等，蓬勃發展，蔚為新潮。在此一時代氛圍中，由兩岸共同關心倫理研究與道德實踐的相關單位和學者專家，於最近一、兩年舉辦了一次以公平正義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會中發表了數十篇精彩的論文，範圍涵蓋上述應用倫理諸議題，因限於篇幅與主題性質的考量，由編審小組選出較具有代表性且與主題相近的十餘篇論文，經作者修改後編輯成冊，並以「應用倫理學的新面向」為書名刊行。謹對各篇作者致以誠摯的謝意；並對未獲選入的學者們表達最深的歉意。

劉阿榮 謹識於元智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2007年11月

目 錄

序 i

- 1 自利與公益的調和及衝突／孫 震 1
- 2 科技時代「倫理」功利觀的昇華蛻變之路／李奇茂 17
- 3 論儒墨社會公平觀／高柏園 23
- 4 「道德意識」在現代社會中的可能義涵及作用——以「儒家」思想為例的展開／林安梧 41
- 5 儒家的義利觀與現代社會公平正義之實踐／劉煥雲、沈宗瑞、張民光 73
- 6 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正義觀之比較／王淑芹 103
- 7 公僕意識、行政倫理與社會公平正義／王 偉 119
- 8 審議民主與社會正義／林火旺 149
- 9 非政府組織及其倫理功能／安雲鳳 179
- 10 社會和諧的公正理念／葛晨虹 195
- 11 人權、正義與企業倫理／葉保強 203
- 12 企業社會責任與社會公正／李蘭芬、倪黎 227
- 13 當代文化產業經濟目標調和商業倫理的意義與價值／林國章 241
- 14 傳統宗教對當代環境議題的回應——以西方的基督教和台灣的佛教為例／朱建民 269
- 15 生態移民與環境正義——以內蒙古鄂托克旗為例／任國英 281
- 16 新自由主義的環境正義觀——以 John Rawls 的正義理論為例／石慧瑩、劉阿榮 301

孫 震

1

自利與公益的調和及衝突

- 前 言
- 自利、公益調和說
- 自利必須建立在公平的基礎上
- 價值的創造與分享
- 企業的社會責任與公平
- 自利的社會後果
- 儒家思想的社會意義
- 結 語

孫震 元智大學名譽講座、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一、前言

在一般觀念中，自利和公益是兩件不相容的事，追求自利不免犧牲公益，而謀求公益難免妨礙自利。不過進一步思考就會發現，這樣的說法只有在以下兩個假定下才能成立。第一個假定是總資源固定，自己得到多，別人能得到的就減少；反之別人得到多，自己能得到的就減少。因此自利和公益在資源一定的條件下是互相衝突的。如果資源由於我們追求自利或公益的行動而增加，使二者可以得兼，則剩下的不過是分配多少的問題。第二個假定是我們只有從自利中感到幸福或得到喜樂，因此才會有損人利己的行為。不過事實並非如此，自古以來，中外思想家都說，人有利己之心，也有利他之心。我們不僅從自己的利益中得到快樂，也從別人的利益中得到快樂。因此，不但別人的利益增加並非一定使我們的利益減少，而且我們的利益減少也不一定表示我們的幸福會減少，可能更增加。

因此如果我們去掉這兩個假定，接著就會發生兩個重要的社會與人生最基本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究竟追求自利或公益何者更能使社會可用的總資源增加？第二個問題是：究竟人生幸福的來源是什麼？關於第一個問題，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所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思想認為，追求自利更能使總資源增加，因而追求自利可以使自己和別人都得到更多的利益。我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則認為促進公益較能使總資源增加；更重要的是，儒家最關心的其實不是總資源增加多少，甚至增加或不增加，而是義利之辨的義。這兩種思想有其時間的差距，也反映不同的技術條件。

史密斯在他的《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中提出自利與公益調和學說。他最常被引用的名

言是：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冥冥中好像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帶領其達到公共的利益，而且比蓄意想達到公益更有效。他的理論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了道德上的正當性。人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努力，結果推動了經濟進步，讓大家更富裕；但過分看重自利也會產生流弊，結果使公益受損。

那麼我們是否應回到孔子「子罕言利」和孟子「王何必曰利」的境界？如果大家不在乎自利，只熱心公益，經濟會不斷成長嗎？又縱然推動公益也可使經濟成長，總資源增加，但其效率如何？公益比自利更能促進成長、增加資源嗎？以下先說亞當·史密斯的理論。

二、自利、公益調和說

史密斯的「一隻看不見的手」(An invisible hand) 在上千頁的《國富論》中只出現一次，卻被引用最多。這隻看不見的手究竟是什麼？史密斯未加解釋。有人說是制度，有人說是市場，有人說是當時習用的表達方法。為什麼個人追求自利可以達成公益？史密斯說：

「通常他既無意去促進公益，也不知促進了多少。他優先投資於國內產業而非國外產業是為了自己的安全。他如此經營此產業以獲致最大的產值，是為了自己的利得。他在此一情況和在很多其他情況一樣，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所帶領，達成了原本無意達成的目的。他無意於此亦非對社會不利，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有意促進社會利益，更能有效達成社會的利益。」(IV. ii. 9)

史密斯又說：

「我們有飯吃，並非因為肉商、酒商和麵包商的恩惠，而是因為他

們知道對他們有利。我們是投其所好，而非訴諸他們的善心和好意。永遠不要告訴他們自己多需要，只告訴他們對他們有多少好處。」
(I. ii. 2)

沒有人比我們自己更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而且任何交易只有在買賣雙方都有利的情形下才會成立。所以在市場經濟中，每個人只須主張自己的利益，而由對方主張他自己的利益，無須像《鏡花緣》中的君子國，買賣雙方各為對方的利益爭執。為對方的利益考慮，誠然是一種崇高的情操，然而既不能使消費者的欲望得到最大的滿足，因而產生最大的效用，也不能使資源利用發揮最大的效果。

有趣的是，兩千多年前我國西漢初年的史家司馬遷在他的《史記·貨殖列傳》中，對於個人發揮自己的能力與專長、追求欲望的滿足，經過供需增減、價格變動，所產生的市場效果，有十分生動的描寫。司馬遷說：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史密斯發現了市場功能因而主張經濟自由、減少干涉，司馬遷二千多年前有同樣的主張。司馬遷在〈貨殖列傳〉開宗明義就說：

「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己。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司馬遷不僅道出了市場的功能，而且列舉了不同程度政府干預、經濟計畫的可能性。他認為最好順應市場（因之，market friendly），最應

避免與之抗爭。二十世紀世界經濟發展的經驗證明，司馬遷可謂真知灼見，可惜未能發展為經濟學，而留待一千八百多年以後英國的亞當·史密斯。

三、自利必須建立在公平的基礎上

亞當·史密斯是從道德哲學出發，發展出他的經濟學。很少人（包括經濟學者）讀過史密斯的《國富論》，更少人讀過他的《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1759），史密斯的經濟學建立在倫理的基礎上，史密斯二百多年來為人誤解，經濟學者亦為人誤解，被視為冷漠無情。然而史密斯在《道德情操論》中，開宗明義就說：

「無論我們認為人如何自私，在他的天性中必然有若干原則，使他關心他人的幸福和喜樂，雖然他從中並無所獲，只不過樂於看到而已。那就是同情或憐憫，也就是當我們看到別人不幸所感到的一種情緒。我們從他人的哀傷中感受到哀傷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不需要任何證明。而這種情操像人性中其他原始的熱忱一樣，並不限於善良慈悲之士，即使是窮凶極惡之輩與鐵石心腸的亡命之徒，亦非全無同情之心。」（台灣協志版，頁1）

史密斯被視為資本主義的代言人，他的經濟主張被認為只顧自利，罔顧經濟弱者的福利。然而上面的話是否像孟子？史密斯也和孟子一樣，特別強調對兒童的關注。他說：人的天性對子女比對父母更多同情與感應，對子女的無微不至也勝過對父母的尊敬和感激。在自然眼中，兒童似乎比老人更重要，也往往激發更強烈、更普遍的關懷，因為兒童之生存全賴父母照顧，而且萬物皆有待於兒童。孟子的「孺子將入於井」反映同樣的心態，只是他不會這樣講出來而已。

人有利己之心，也有利他之心。沒有利己之心就不可能生存，沒有利他之心不可能發展成社會。史密斯從我們對自己和他人的關懷，引伸出三種美德。我們關心自己的幸福，因而有審慎的美德（the virtue of prudence），我們關心他人的幸福，因而有公平的美德（the virtue of justice）和仁慈的美德（the virtue of beneficence）。關心自己的幸福是生物的本能，關心他人的幸福出於同情之心，是一種投射。因而利己之心強烈，利他之心薄弱。

進一步分析，審慎是對自己生存發展條件的重視與維護。在史密斯的思想中，審慎包括健康的照顧、財富的追求，以及地位與聲望的建立。這些都是人生愉悅與幸福之所寄託及憑藉。我們生而飢思食、寒思衣，好喜樂而惡苦痛，都可視為大自然的聲音，指示我們如何趨吉避凶，以維護身體的良好狀況。顧好自己的身體，使其健康成長，是自然賦予我們首要的任務。然而我們要有足夠的財富才能取得所需的資源與便利，以享受安樂，免於貧窮。除了財富，我們尚需要地位、聲望和尊敬。史密斯認為，地位、聲望和尊敬可能是我們所有欲望中最強烈的欲望，這些欲望的達到，也需要財富，當然更重要的是要有高尚的品德和行為，才能贏得信任和尊敬。

史密斯尋求以強烈的利己心為動力，讓人們追求自利，以推動社會的公益；但追求自利必須遵守公平的原則：公平是不傷害別人，仁慈是幫助別人，增進別人的福祉；公平是「絕對的義務」，仁慈是非絕對的義務。

四、價值的創造與分享

別人的利益不減少，自己的利益從何而來？來自創造了增加的價值（added value）。這是因為企業生產貨物或勞務滿足消費者的需要，需要

的滿足產生效用 (utility)，效用產生價值。嚴格說應為市場價值 (market value) 或經濟價值 (economic value)，因為人生尚有其他方面的價值，留待下文討論。

企業募集資金，僱用生產因素，購置機器設備與原、材料，從事生產、創造價值。在生產的過程中，地主得到租金，資本主得到利息，員工得到薪資，機器設備與原、材料的供應者得到價款，投資人得到利潤，如經營不當，利潤可能是負值。

我們將所有企業所生產的總價值相加，減去「中間產品」(intermediate products)，即投入之機器設備、原材料，所得到的「最後產品」(final products)，就是這些企業經由生產所創造的「增加的價值」(added value 或 value added)，叫做「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或「國民生產毛額」(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GNP 恰等於所有生產因素的所有主以其生產因素參與生產所得到的報酬或所得總和，叫做「國民所得毛額」(Gross National Income, GNI)。

公平就是使所有相關的利害關係者都得到公平的對待，不受到損害，即不欺騙顧客與投資人，不剝削員工，不虧欠生意伙伴。企業以最有效率的方法，生產最為社會需要的產品，其所創造的價值即最大，因而利潤最多。所以自利和公益是一致的。社會因個人追求自利而達到公益。

利潤有兩個重要的社會意義，一個是作為生產效率的指標，一個是作為資源分配的指標。效率包括生產方法的效率和選擇產品的效率，後者就是晚近流行的「藍海策略」(blue ocean strategy)。¹生產方法的效率基本上有三個重要的來源，即管理、資本與技術。管理是指由於組織與管理方法改進使勞動生產力提高；資本是指資本增加使勞動生產力提

¹黃秀媛譯(2005)，W. Chan Kim & Renée Mauborgne 著，《藍海策略》。台北：天下文化。

高；技術是指由於技術進步使勞動生產力提高。資本相對於勞力增加雖可使生產力提高，但由於「邊際報酬遞減法則」（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s）的作用，最後會下降為零，因此技術進步是生產力不斷提高、經濟不斷成長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有了以現代科學為基礎的技術不斷進步，才有人均所得不斷增加的現代經濟成長。不過如果沒有新產品出現，技術不斷進步，生產力不斷提高，會使現有產品的邊際效用（marginal utility）下降為零，失業增加，因此必須有新產品不斷出現，這就是「藍海策略」的要點。「藍海策略」指避免生產技術方面的激烈競爭，轉向創造新商品與服務的競爭。資源分配包括在使用者之間的分配與產業之間的分配。資源流向最能有效使用資源之人與利潤最高之產業，因而使社會有限的資源，產生最大的價值，滿足最大的需要。

五、企業的社會責任與公平

亞當·史密斯原為蘇格蘭 Glasgow 大學道德哲學的教授，後來發展出他的經濟學。他的《國富論》雖建立在「公平」的基礎上，但基本上他更依靠市場和競爭保障個別的利益，而不是靠每個人發揮自己的公平正義之心和利他的胸懷。所以他說永遠不要告訴他們自己多需要，只告訴他們對他們有多少好處。商品、勞工、土地、資金、機器設備和原材料，各有其市場決定買賣雙方都接受的價格，市場保障了公平。所以他的現代信徒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傅利曼（Milton Friedman）說：企業只有一個社會責任，就是在遊戲規則的範圍內使用其資源，從事增加利潤之活動，所謂遊戲規則就是從事公開自由的競爭，而不欺騙作偽。

不過在現實生活中，欺騙作偽隨時、到處可見，公平競爭並不常存在，消費者和勞動者勢單力薄往往無法保護自己，以致權益受損，需要道德的號召與制度的節制。此外，經濟高度發達，經濟活動的外部不經

濟 (external diseconomies) 對社會和自然環境所產生的傷害日愈嚴重，引起新的關懷，主張企業除了賺錢也應負起其社會責任。企業的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就是要照顧到其利害關係者的利益，包括顧客、員工、生意伙伴、社區、社會與自然環境，這種主張稱為「利害關係者理論」 (stakeholders theory)，對照之下，傅利曼的主張稱為股票所有者理論或股東至上論 (shareholders theory)。

企業社會責任中的利害關係者並非都屬相同的性質，因而照顧的方式應亦有所不同。顧客、員工、生意伙伴原則上可藉市場機制得到公平的報酬。不過如果完全依賴市場，則供需決定價格，價格影響供需，在調整的過程中產生額外成本，因此在順從市場決定之外，仍應付出照顧與關懷，為斤斤計較的市場機制，增加人情的溫暖。對社會與自然環境的外部不經濟應力求避免，或給予適當的補償；公益支出應以到達其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之點為限，過此則損及股東或投資者的權益。其實這一切都是史密斯主張的公平。

重視公平基本上有兩個原因：第一，公平才能久遠，才能和平共生，無公平即無法維持秩序、穩定與效率；第二，公平本身就是一種最終目的 (ultimate end) 或絕對價值 (absolute value)，源自人的利他胸懷，有此胸懷才能形成社會。公平和公正、公義是同義字，譯自 justice，社會包含自利、公平與仁慈，並非只是利益的結合。

社會如失去公平，以致影響秩序、穩定與效率，等待自我糾正，必然曠日廢時，而且一定會付出很大的代價。因此社會必須同樣重視自利與公平，才能維持和諧、穩定的發展，仁慈則讓社會充滿溫馨與感動，相信是每一理想社會都追求的境界。

六、自利的社會後果

在公平的原則下追求自利，才能將努力引導至經濟價值的創造，產生所得，累積財富。人的欲望雖然無窮，曹操說：「人苦於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然而正如韋伯（Max Weber）所說，貪得無厭是古今各國共同的現象，但並未導致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主義反而是有節制的追求財富。

然而過分重視自利，賦予功利上和道德上的正當性，加以強調，很容易使人性中原本即較為薄弱的公平退居次要的地位。我們相信社會上絕大多數的人都重視自利與利他，然而當外在條件使二者不可得兼，或維持公平所需付出的自利代價愈大時，弊端就會暗中滋長。難怪梭羅（Lester Thurow）說，企業醜聞是資本主義的常態而非偶然。²

顧客、員工和生意伙伴雖然可能常受到欺騙，但畢竟有市場的保障，而且因為受害者是具體確定的對象，容易立刻察覺與救濟。所以晚近我們所熟悉的重大企業醜聞幾乎都是以廣大、分散的投資者、金融系統、政府為算計的對象，而最後的受害人是不知情甚至是至死不悟的社會大眾。

例如美國 2001 年 12 月爆發的安隆（Enron）醜聞，和 2002 年 6 月的「世界通信」（WorldCom）。基本上，安隆是利用特別目的組織（SPE）隱藏不利財報，維持偏高的股價，從中取利，使不知情的投資者慘遭損失。世界通信是將維護費用當作資本支出處理，並降低各種提存以降低成本，虛增利潤，以欺騙大眾。在台灣，企業醜聞的主要形式則是掏空自己的公司，或甚至進一步藉政府「紓困、救經濟」，取得銀行資金，飽入私囊，逍遙法外。

²轉引自孫震（2004），〈梭羅看企業醜聞〉，《理當如此——企業永續經營之道》。台北：天下文化，頁 133-134。

資本主義不僅是一種制度，也是一種文化，過分重視經濟發展使自利，具體的說，使金錢成為這種文化的主流價值，其他一切價值包括對社會關懷的倫理價值與物欲以外的精神價值，都失去其重要性，社會即向下沉淪。這時我們是否會想起傳統儒家思想的社會意義呢？

七、儒家思想的社會意義

我們如果說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功利思想重視利己，而且以此為動力，推動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而我國傳統的儒家思想重視利他，而欲推而廣之，擴而充之，以增進社會的福祉，大致應可為學者所接受。孟子所說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其實就是史密斯所說的我們不僅關心自己的幸福，也關心他人的幸福。孟子認為，不忍人之心產生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他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孫丑）就是說，如果我們不能擴充此利他之胸懷，只重視自己的利益，社會引起爭奪，導致社會的衝突與不安，反過來影響自己的生活。所以他又說：「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餒。」（梁惠王）

然而這並不是說儒家思想不重視自利。正如史密斯所說，利己是生物的本能，比利他更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人如果不知利己，根本不可能生存。孟子雖然批評「楊子為我是無君也」（沒有社會觀念），但他也批評「墨子兼愛是無父也」（沒有家庭觀念）。孔子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他只是更重視原則。他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魯君違背他的原則，他寧願離開魯國去周遊列國。在陳絕糧，子貢勸他說：「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也。」孔子對